

第五輯

◎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 編

WEN JIN XUE ZHI
文津學誌

任繼愈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 編

WEN JIN XUE ZHI

文津學誌

任繼愈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五輯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津學誌(第五輯)/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013-4846-6

I. ①文… II. ①國… III. ①古籍—善本—研究—中國—叢刊 IV. ①G255.1-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88965 號

責任編輯:耿素麗 許海燕

書名 文津學誌(第五輯)

著者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 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瀚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26.25

印數 1—500 冊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013-4846-6

定價 78.00 圓

主 編 詹福瑞

副主編 陳 力 張志清 陳紅彥 郭又陵

學術顧問 白化文 安平秋 李致忠 程毅中 楊成凱

編 委(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世偉 史 睿 杜偉生 李際寧 吳 格 汪桂海 沈 津

林世田 郭又陵 陳 力 陳先行 陳紅彥 張志清 程有慶

詹福瑞 冀亞平 鮑國強 謝冬榮

本期執行主編 鮑國強 趙愛學 白鴻葉

責任編輯 耿素麗 許海燕

文津學誌(第五輯)

目 錄

· 文獻整理與版本研究 ·

談銅版	艾俊川(1)
《淮南子·要略篇》校補	蕭 旭(23)
國家圖書館藏《古文春秋左傳》版本、序跋及輯者考釋	梁葆莉(37)
支遁作品目錄及內容考辨	戴麗琴(50)
從行款版式及字體談兩宋時期的《文選》版本 ——以國家圖書館藏本為核心的考察	劉 明(59)
試論《紅雨樓題跋》林佶抄本的價值	唐桂艷(72)
孤本《萬曲合選》初考	肖伊緋(78)
胡承珙《毛詩後箋》成書及版本考述	陳 才(86)
日本版《高青邱詩醇》考略	賈繼用(94)
《書目答問匯補》後記	李國慶(98)

· 歷史地理與古地圖研究 ·

淺談中國傳統輿圖繪製年代的判定以及偽本的鑒別	成一農(105)
黃河源繪製體系的初步研究	李新貴(114)
《藏紀概》成書背景與文獻價值	柳 森(133)
國家圖書館藏“全漕運道圖”與乾隆朝漕政	席會東(140)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藏明清沿海輿圖概述	孫靖國(152)
清代木刻《桃花潭圖》及其景觀詩文考略	鮑國強(167)
燕京舊照小考	趙 衡(180)

· 金石文獻整理與研究 ·

珍貴的早期甲骨拓本——解讀《匋齊藏古龜版文字》	胡輝平(189)
清宮舊藏墨拓本《蘭亭序》	趙 前(196)
《琅琊帖》源流考——兼論《澄清堂帖》邢侗及各家藏本的一些問題	胡海帆(200)

論《金石錄》對《集古錄》的補正	謝 輝(219)
• 樣式雷圖檔整理與研究 •	
樣式雷設計圖與文字檔關係考辨	翁瑩芳(231)
樣式雷圖檔中衙署著者考辨	白鴻葉(239)
木廠與清代皇家建築工程——以國家圖書館藏樣式雷圖檔為例	王豐會(246)
樣式雷設計圖廢底考略	吳碧華(251)
• 典籍史文獻與研究 •	
清康熙間范邨鼎五經堂刻書	蘇晚君(256)
袁克文藏書概述	李紅英(266)
《古今典籍聚散考》求瑕	劉 鵬(279)
徐坊致繆荃孫書札考釋	崔建利(287)
陳澄中致王晉卿函十一通箋釋	楊 健(295)
• 古籍編目實踐與理論 •	
藏板與古籍著錄	何遠景(302)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四級分類原則初探	殷衍韜 謝明仁(316)
• 館藏文獻整理與編目 •	
文津閣《四庫全書》大事記	董 蕊 林世田(323)
“洋灰陳”父子與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	金 靖(329)
國家圖書館2010年入藏阮元文獻舉要	王維若(341)
國家圖書館西文善本之李一氓藏書淺談	彭福英(349)
安徽稀見古籍敘錄	倪清華(357)
• 文獻保護 •	
簡述當前我國古籍修復的三大力量	臧春華(365)
日本文物保護修復人才培養模式淺介	謝謹誠(377)
英國修復專業及其教學情況管窺——以倫敦藝術大學為例	侯鬱然(389)
本無畛域——談“天津圖書館藏珍貴古籍保護與研究項目”	萬 群(395)
宋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綱目》的修復問題	朱振彬(400)
淺談古籍書葉修復中干濕補技法的綜合運用	傅艷紅(405)

談銅版

艾俊川

內容提要：本文以文字考據、版面觀察為主要方法，結合金屬史等知識，系統梳理了歷史上與“銅版”有關的信息，對中國書史中衆說紛紜的“銅版問題”提出新的認識。

某些科舉用書標榜“銅版”，只是一種商業廣告行為，其“銅版”義同“監本”，表示書的內容經官方校定，文字正確無誤。相臺岳氏《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著錄的“晉天福銅版”，極有可能指馮道等主持校刊的“五代監本”。從技術和成本角度看，中國古代應無整版雕刻或鑄造的銅質書版，也不存在相應的“銅版本”。

傳統印刷技術下的“銅版”是銅活字版。銅及錫等金屬與木頭物性不同，使用不同材質的活字在書葉上留下的墨痕也不同，形成各自的版面特徵。根據這些特徵，結合相關文獻，可以鑒別區分銅、錫活字本和木活字本。從鑒定結果看，清康熙間吹藜閣活字印《文苑英華律賦選》和元代活字印《御試策》，應為木活字印本；明無錫華氏會通館“活字銅版”，有可能是錫活字。

關鍵詞：銅版 銅版印刷 天福銅版 鑄金刷楮 監本 銅活字本 版本鑒定 文苑英華律賦選 御試策 活字銅版 會通館

“銅版”在中國書史中是一個重要、複雜並且敏感的問題。銅是古人在木頭之外利用最多的製版材料，也有一些銅質書版印刷的書保留到今天。同時，文獻中還有一些與“銅版”有關的記載。

由於古代銅版印刷工具未能留存，也未留下詳細的技術資料，今人對古代銅版印刷的瞭解還比較膚淺，乃至存在誤解。由此影響到在鑒定銅質書版印本（如銅活字本）時，只注重文字資料，未能充分利用由印刷工藝形成的版面特徵。而這些文字資料，有的語焉不詳，有的相互矛盾，也有的似是而非，導致在此基礎上的研究難以形成定論。無論是印刷史研究還是版本鑒定，在涉及“銅版”時，一直存在各種爭論和疑問，有的爭論還非常激烈。

本文所談，是作者多年來對有關“銅版”問題的粗淺觀察和思考。總的思路是：梳理中國書史中的“銅版”信息，分辨它們是實有其事的印刷技術，還是徒為誇飾的語言修辭，然後對不同性質的問題，嘗試用不同方法來解決。

一、標榜“銅版”的書與“銅雕版”

在存世古書中，有一些喜歡在封面等位置標明“銅版”（常寫作“銅板”，隨文照錄）字樣。略舉國家圖書館藏數種為例：

《五經揭要》，書名頁題“銅板五經揭要”。館藏目錄著錄為“清光緒2年寶善堂刻本”。

《書經》，書名頁題“銅板書經”。館藏目錄著錄為“清光緒7年刻本”。

《四書述要》，書名頁題“聚秀堂銅板四書述要”（如圖1）。館藏目錄著錄為“清乾隆間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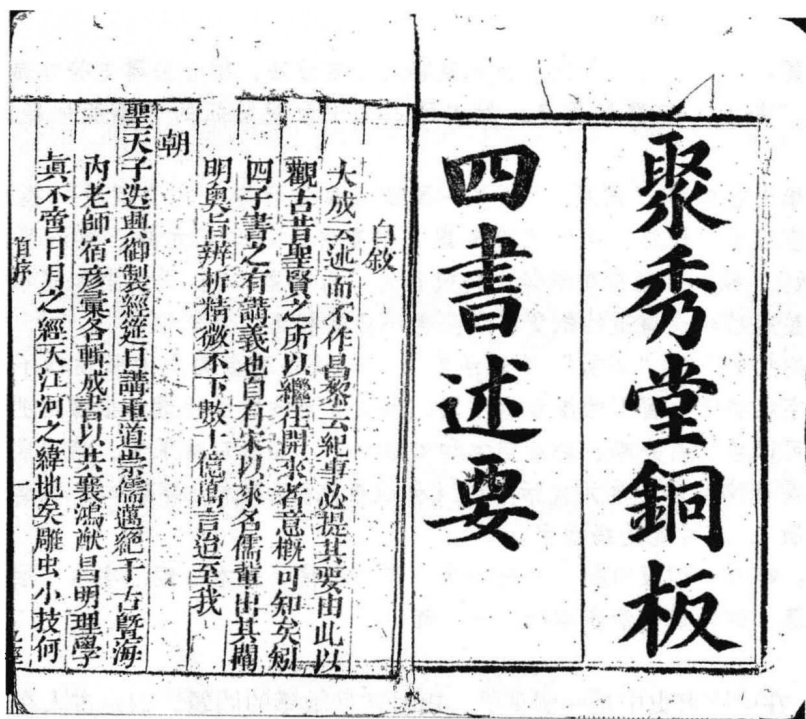


圖1 《聚秀堂銅板四書述要》，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158181。

《新訂四書補注備旨》，書名頁題“銅板四書補注附考備旨”。館藏目錄著錄為“清刻本”。

《中庸》，書簽題“銅版中庸集注”。館藏目錄著錄為“民國間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

還可以舉出更多例子。這些書多是科舉考試用書，儘管封面、書簽等處標明“銅板（版）”，但編目人員仍將其版本確定為刻本或石印本，而非銅版印本。這說明在專業人士眼中，所謂“銅板（版）”只是一種修辭，並非表示書籍的實際印刷方式。

在民間，如各古舊書買賣場合，這類標榜“銅板”的書也很常見，內容也多為科舉用書。同樣，具有一定版本鑒定能力的人，也不會認為這些書是用銅版印刷的。因為

它們的版面特徵與刻本或石印本並無二致。

清代有使用西方技術製作的腐蝕銅版，用來印製畫冊、地圖等，但與中國傳統出版印刷業說的銅版沒有關係。故下文的討論不包括這類銅版。

對木雕版來說，與“可能的銅雕版”相互區分的特徵，除印本的墨色和木紋、刀痕印跡等，最有說服力的應是斷版印跡。木版版面會順着木紋或木料接縫斷裂，而且往往從橫列的文字中穿過。由於木版雙面雕刻，這種斷版會影響相鄰兩葉（如圖2）。銅雕版不易斷裂，即使斷裂，其斷處應在被削弱的無字處，而不是加厚的文字處。石印是近代西方平版印刷技術，與屬於凸版印刷的“銅版”有本質區別，其印本更容易區別，在此不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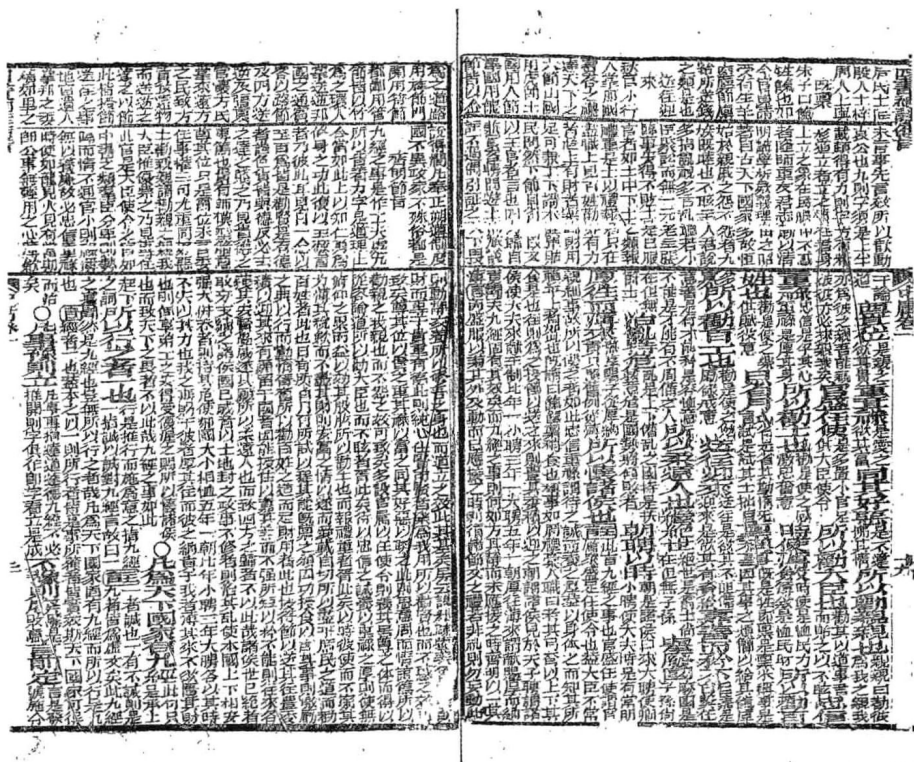


圖2 《銅板四書補注附考備旨》，《中庸》第19、20兩葉。此兩葉由一塊斷裂的雙面雕版印成，斷版綫貫穿第19葉後頁中欄第8列和第20葉前頁中欄第9列文字。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64795。

這類書被證實不是銅雕版或鑄版，實際上說明一個道理：至少在清代，在科舉用書市場，銅版印本並不存在。

製作銅印版的方法，無非鑄造和刻製。上述“銅版五經”、“銅版四書”，均為高頭講章，字小行密。如《聚秀堂銅板四書述要》，半框小字23行52字，全葉刻滿近2400字。以當時的銅加工技術、出版業投入產出情況及社會環境，不可能造出銅版來印這類書。

從鑄造角度說，書版文字既多又小，將縱橫交錯的筆劃看作圖案，其複雜程度超出

古今所有銅器。以清代民間鑄銅技術，人們無法保證銅液流入書版範型的所有角落、填滿每一道筆劃而又不產生流銅、氣孔，得到所有文字均完整清晰足堪印刷的大套書版。其實官方技術也做不到。參觀故宮、頤和園時，細心的人會發現，宮殿前擺設的銅獸身上斑斑點點，盡是修補痕跡，反映出當時鑄銅技術的局限。這還是素面而非文字。鑄錢業掌握着歷代最高鑄銅技術，錢文僅四個大字，鑄造時也會出現大量殘次品。

宋代以來鑄造銅版印刷紙鈔，是否能說明可鑄造銅版來印書呢？理論上沒問題，實際中做不到。鈔版字大、圖案簡單，只有一塊版，而且國家行為不計工本，可以大量複製，從衆多鑄件中選出合格的印版。印書相反，需要鑄造內容不同的多塊印版組成一套書版，且文多字密。每塊書版的鑄造瑕疵不能多，2000字中只要有1%的文字殘缺，鑄成的版就等同廢品。失蠟法鑄造遇到這種情況，需要重新製模，當然毫無可能；翻砂法鑄造，倒是可以利用木模重鑄，但模子刻完，已是能夠直接印刷的雕版，還有什麼必要去翻鑄很難成功的銅版呢？而且翻砂鑄造精度低，更難鑄出合格的銅書版。

再看刻製。與篆刻家刻印可以精雕細鑿不同，刻書版屬於手工業生產，要求高效率低成本；銅版難以修改，又要求高质量少差錯。不能想像以當時的工具，能用短時間在一塊銅板上刻出2000多個筆劃細小繁複的陽文銅字。最難的工作，應是在既不損壞筆劃、又保持版面平整的情況下，剔掉筆劃圍合區的餘銅。保留的是“錢”，剔除的是“面”，要去掉這些堅硬而根深蒂固的“多餘物”，無論使用刀削鑿剔，都需要手和眼在極小空間內精細配合，稍有差池，就會傷及文字，前功盡棄。而且當時供大規模生產所用的銅料是黃銅和青銅，其硬度是難以用刀雕刻的。因此用雕刻方法也難製銅版。

清代檔案曾記載武英殿刻銅字人的工價為每字白銀二分五厘。^①不知這些人所刻何物。假設他們能刻細小的陽文，按此工價，聚秀堂刻一葉銅版，僅工錢就需要60兩，刻完全書，堪稱天價，這還沒算上昂貴的銅價。標榜“銅版”的科舉用書都是市場上的低端出版物，講究薄利多銷，從商業角度看，用如此成本刻版印書，斷無可能。

清代還是屢申銅禁的朝代，民間大量用銅屬於違禁行為。

既然從版面特徵、從物理人情的各個角度看，清代以來標明“銅板（版）”的書都不是也不會是真正的銅版印本，那麼這類“銅版”就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語言問題。如何理解？下文再說。

二、銅字鑄造與刻製

《荀子·勸學篇》云，“鑲而不捨，金石可鏤”，其實說的是鏤銅的艱難。中國有超過3000年的銅文化史，歷代均有大量銅器流傳下來，除了晚近的銅印章，要找到一個刻有陽文文字的銅器卻不容易。帶文字的銅器當然很多，陽文的也有，字數多的如永樂大鐘有銘文十餘萬字，但字都是鑄成的。在青銅器上，有時會有刀鑿刻畫的陰文文字，看上去都粗陋幼稚，與鑄字相比，工拙不可以道里計。如圖3。

中國的用銅史，根據周衛榮研究，大致以明嘉靖（1522—1566）為界。之前主要使用青銅，之後主要使用黃銅。^②這兩種銅合金，都是高硬度的金屬。清康熙末年人朱象賢《印典》卷七在談到篆刻所用銅料時說：



圖3 元至元二十五年鑄“昏爛鈔印”拓片。左為刻製陰文，右為鑄製陽文。《中國古鈔圖輯》第151頁。中國金融出版社，1992。

銅出海外，色紅而性純，以之作印最妙，蓋能傳之久而文足重也。銅內和以青鉛則色淡，古人造器亦用之；和以白鉛則黃而質硬，古無用者，鑄字、鑿字則可，刻則費力耳。雲南所產煉成白銅，其性亦純，可以並用。^③

青鉛即錫，與銅的合金為青銅；白鉛即鋅，與銅的合金為黃銅，都只能鑄字、鑿字，難以雕刻；紅銅和雲南白銅能鑄能刻。這是當時掌握刻銅技術者的現身說法，也符合今天的考古學和金屬學認識。但紅銅為純銅，熔點比青銅、黃銅高，熔煉難度大，質軟易變形，又需要從海外進口，成本較高；白銅為銅鎳合金。明宋應星《天工開物》中說它“工費倍難，侈者事之”^④，成本更高。紅銅和白銅，都不是大規模銅器生產使用的原料。瞭解這些銅史知識，有助於認識古代的“銅版”印刷問題。

因為技術能力限制、成本高昂、局部瑕疵會導致整體失敗，古人難以製成“密行小字”的用來印刷書籍的大套銅版，但他們可以製出銅活字。活字排印能夠降低單位印刷成本，而且無論雕刻還是鑄造，單體次品都不會影響全局。於是“銅活字本”遂成為中國書史的一個重要內容。但這又帶來另一個問題：古代銅活字是刻的還是鑄的？對此，現代學者看法不一，古人甚至當事人也沒說清楚。

如清道光間福建人林春祺製造40餘萬枚銅活字，排印了《音學五書》等幾部書。在書中，林春祺幾次說銅字是鑄刻的，“捐資興工鑄刊”、“計刻有《正韻》筆劃楷書銅字大小各二十餘萬字”、“林春祺怡齋捐鑄”等，言之鑿鑿，令人不得不相信這些銅字是刻成的。印刷史、版本學著作也多附和他的說法。但是潘吉星在《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中認為此字是鑄造的而非鑄刻的，並認為“古代所有金屬活字都應以鑄造方式鑄成”^⑤。他的觀點在林氏活字上是正確的，因為林氏印書同一葉上同一字的字形完全一致，乃至有共同缺陷，證明其字係使用同一個字模翻砂鑄成。林氏稱“鑄”、“刻”，是語言習慣而不是技術描述。在這裏，一個語言問題掩蓋了技術問題。

“金屬活字鑄造說”遇到的一個挑戰，是以明弘治、正德間（1488—1521）無錫華氏和安氏為代表的“銅版活字”。這些活字的特點是逐字不同，顯然非翻砂鑄成。其時處於青銅時代，青銅難以雕刻，所以也不會是雕刻的青銅字。對華氏活字，明代有文獻

說是錫活字。錫性軟易刻，很有可能。

“鑄造說”遇到的最大挑戰，是清“武英殿銅活字”。這套活字印刷了《古今圖書集成》及其他幾種書，若以冊數和字數論，是古代印書最多的活字。對這套字，清朝有人說是鑄造的，但按乾隆皇帝等人的說法，是雕刻的銅字。仔細觀察，也可發現每個字的字形都有差異，難說是翻砂鑄成的。雖然當時主要使用黃銅，難以雕刻，但紅銅、雲南白銅等易雕材料也在使用，而且通過傳教士進行的中西技術交流已很深入，有可能帶來某些工具、技術改進^⑥，再加上清廷高薪雇用熟練工人，綜合各種因素，武英殿銅活字由雕刻而成，也是可能的。

古代朝鮮也多次鑄造銅活字印書。根據字形特徵，可知其內府銅字多為翻砂鑄造。但號稱世存最早金屬活字印本的《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宣光七年，1377）的字形卻逐字不同，顯非翻砂鑄造。究竟如何，未見原書，難以斷言。

這些是與“銅版”有關的技術問題。

三、“天福銅版”與五代監本

如果每部標榜“銅板”的書都算一條獨立信息，加上其他文字記載，古書中出現的“銅版”字樣也不算少，細看又多與“五經”“四書”有關。因此大致可以判斷，“銅板”云云，是與科舉所用儒家經籍密切相關的用語。

最早也是影響最大的“銅板”記載，見於舊題岳珂撰《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書本”：

今以家塾所藏唐石經本、晉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俞紹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並興國于氏、建安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復參訂，始命良工入梓。

“音釋”：

唐石本、晉銅版本、舊新監本、蜀諸本與他善本，並刊古注，若音釋則自為一書。

對此“天福銅版”，明清人認為是銅雕整版。民國以來研究者多認為，《九經》文字多達40餘萬，後晉天福為動亂年代，不可能進行這樣大規模的冶銅工程，因此猜測實為銅活字。

但眾所周知，五代時期雕版印刷術剛剛成熟，後唐長興三年（932）馮道等奏請雕印《九經》，是歷史上官方首次採用雕版印刷術印刷書籍。《五代會要》卷八“經籍”：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秩刻印板，廣頒天下。

這次大規模出版活動經歷4個朝代，為時23年，方於後周廣順三年（953）全部完成。如果說此時就能用銅活字排印《九經》，顯然不符合印刷技術發展的內在邏輯。而且五代雕印《九經》在史書中有大量詳盡記載，也有書籍實物流傳到後世。而“天福銅版”只有數百年後語焉不詳的幾個字（“相臺岳氏”經張政烺等考證，為元人岳浚。但《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的內容應為南宋末文字），既無實物，也無旁證。與雕版情況兩相對照，只能說並無此事。

那麼，又該如何解釋“晉天福銅版”五字呢？我認為，將歷史上的有關信息貫穿起來，雖然尚無直接證據，但可用間接證據組成有說服力的證據鏈，說明“銅版”是長期在科舉用書出版圈內流行的一個詞語，代指“監本”。“晉天福銅版本”即“晉天福監本”。茲嘗試論之。

1. “天福銅版本”在《九經》傳承系統中對應“五代監本”。

五代監本上承唐石經，下啟北宋監本，是版行經籍之祖。而在《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中，“天福銅版本”處於“唐石經本”和“京師大字舊本”之間，在經籍傳承系統中的位置恰相當於五代監本。《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作者對五代監本的認識非常清楚，如“書本”說：“《九經》本行於世多矣……蓋京師胄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字畫”說：“五季而後，鏤版傳印，經籍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訛舛自若。”可見他深知五代監本的祖本地位，但文中列舉23個本子，卻沒有五代監本，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將“晉天福銅版本”理解為“晉天福監本”，這一疑惑即可冰釋。

2. 天福銅版《九經》兼有經注，文本形式與五代監本相同。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音釋”：“唐石本、晉銅板本、舊新監本、蜀諸本與他善本，並刊古注。”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有“監本兼經注”之辯，可參。

3. 五代監本《九經》的主體部分刊刻完成於晉天福間。

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在辨“監本刊刻次序”時認為：

《五經》與《孝經》、《論語》、《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成於晉漢之間，故漢時田敏奉使，以印本《五經》遺高從誨，而《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亦有開運丙午田敏序。至二《禮》二《傳》則經始於乾祐，斷手於廣順，至是遂並《九經》進御。

按《舊五代史》卷八十一，天福八年（943）三月庚寅：“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經》書上進，賜帛五十段。”是《五經》至天福八年已經刻成，這是“九經”的主體部分。田敏為《五經文字》等作序的開運丙午為開運二年（945）。兩年後劉知遠建立後漢，改開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947）。若含混言之，前此十二年皆

可算天福年號。如此，除二《禮》二《傳》外，五代監本經籍的大部分均完成於天福間，將其稱為“天福監本”，也無不妥。

4. 北宋初監本經籍被稱為“金版”。

宋初楊億《武夷新集》卷十九有《答集賢李屯田啟》：

郎中學士名冠士林，學探聖域。梁園奏技，曾參賦雪之流；衛幕從軍，幾擅愈風之妙。自入奉於朝請，仍典校於圖書。屬膠庠大闡於素風，屋壁旁求於墜簡。正石經之訛舛，鑄金版以流傳。詒五行俱下之能，辯三豕渡河之謬，鉛黃斯畢，克彰稽古之功；綸綍載行，式懋成書之業。

此集又有《送集賢李學士員外知歙州序》，知李屯田曾知歙州。按弘治《徽州府志》卷四“名宦”，有宋知州李維，略云：

李維字仲方，洺州肥鄉人。登進士甲科，咸平中乙太常博士，獻頌聖德千言。真宗嘉之，召試中書，為直集賢院屯田員外郎。時兄沆方為宰相，每還家，相與笑言，而未嘗及朝政。然終欲避權勢，乃請知歙州。

楊億所言“典校圖書”的李屯田，就是李維。

李維直集賢院在咸平、景德間（998—1007），參與校訂的經籍，先有“五經”，後有“七經”。校訂“五經”，李維參加了掃尾工作。事見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三：

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敕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鑄板行之……咸平元年正月丁丑，劉可名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二月庚戌，（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李）沆預政。二年，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清、王煥、劉士玄預焉。《五經正義》始畢。

北宋校訂“七經疏”，古書多有記載，以《麟臺故事》所記為賅備。卷二“修纂”：

咸平四年九月，翰林侍講學士國子祭酒邢昺、直秘閣杜鎬、秘閣校理舒雅、直集賢院李維、諸王府侍講孫奭、殿中丞李慕清、大理寺丞王煥、劉士玄、國子監直講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摹印頒行。

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錄黃丕烈舊藏《儀禮疏》校勘經進銜名中有李維：

大宋景德元年六月承奉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騎都尉臣李維校定。

可見，楊億所言“正石經之訛舛，鏤金版以流傳”，就是校正儒家經籍，由國子監刊印行世。“金版”是“監本”的雅言。

政府刊刻石經，為士子提供經籍的標準文本，自古為然。五代時馮道等提議刊刻監本《九經》，其初衷也是因為“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石經）”，故提供一個替代方案。監本的實際作用，仍是為天下士子提供標準文本。在宋代，“金版”既然可以代指“宋代監本”，“天福銅版”就很有可能代指“天福監本”或說“五代監本”，是當時的一個習慣叫法。“金”也好，“銅”也好，都是比喻意義上的，並無本質不同。它們用來表示監本同石經一樣，甚至比石經還要正確無誤、堅不可易，是朝廷勘定頒佈的標準經典文字。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引明楊守陳曰：

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版《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傳亦未廣。

楊守陳去五代已遠，說天福銅版九經“紙墨摹印，無庸筆寫”，顯係揣測之詞，與事實不合。但他將“銅版”的功用等同於石經，還是看到了問題實質的。

5. 出版業對“監本”與“銅版”廣告言辭的使用，古今相應

因為監本是國家頒佈的“標準文本”，出版商就樂意用“監本”來為自己的書打廣告。現存宋版書中很多書名含有“監本”二字。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晚清民國。清代很多科舉用書的卷端、封面等處也大書“監本”，即使國子監根本沒刻印過這些書。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宋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刻本五臣注《文選》，有紹興辛巳（三十一年，1161）江琪刊記，略云：

《文選》之行尚矣。轉相摹刻，不知幾家，字經三寫，誤謬滋多，所謂久則弊也。琪謹將監本與古本參校考正，的無舛錯，其亦弊則新與？收書君子，請將見行板本比對，便可概見。

2011年，北京卓德國際拍賣公司徵集到一部《鉅宋廣韻》，經鑒定為南宋刻本。也有刊記說：

《廣韻》日前數家雖已雕印，非惟字體不真，抑亦音切訛謬。本宅今將監本校正，的為精當，收書賢士請認麻沙鎮南劉仕隆宅真本。^⑦

張秀民等《中國印刷史》著錄一部清雍正八年（1730）啟盛堂印《四書體注》，封面下有朱印廣告說：

《體注》一書行世已久……余不惜工本，將銅版精刊，字跡端楷，點畫無訛。^⑧

此本今不知所在。張秀民據此廣告，認為這本《四書體注》乃“銅刻整版”所印，並標目為“江寧銅版”。按我們在第一節的論證，清代不可能有“銅刻整版”，所謂“將銅板精刊”，只是出版商的廣告修辭。如果將啟盛堂的廣告語和上引南宋《文選》及《廣韻》的廣告語對看，就會豁然開朗：二者句式和語義實在是一樣的，都說自己的書文本標準，沒有錯誤。“銅板”的意思等同於“監本”。

這也解釋了文首列舉的那些木版刊刻的《五經》《四書》，為何會在封面上標榜“銅版”——其實都是廣告，“銅板”與印版是否銅製毫無關係。清代標榜“監本”的書與國子監也沒有關係。這種出版廣告方式從宋代延續下來，“銅板”和“監本”同義，出版商按喜好取用即是。

明代“活字銅板”印的書，一般會在版心等處印上這四個字。在文中出現的，有弘治八年（1495）華燧《會通館印正〈容齋隨筆〉序》，略云：

《容齋隨筆》，書之博者也；提綱挈領，博而能約者也。書成於宋學士洪景廬，學者歆羨而未得其真者久矣。太醫院醫士吳郡盛用美得之於京師，士夫欲版其行，邑宰邢君傷民用而未行。適食憲雷公水利江南，巡行吾錫，遂致禮會通館以達君志。嗚呼！燧生當文明之運，而活字銅板，樂天之成，苟以是心至，應之惟謹，況士夫以稽古為事，君以愛民為心，而公禮意兼至者乎？

過去對此序，祇看重“活字銅板”四字。其實將題目與序文合觀，會發現華燧標榜的是“印正”、“真者”，宣傳書的內容而非印製技術。如果“銅板”作為技術客觀存在，也被他借來一語雙關，為一個“正本”、“真本”《容齋隨筆》打了廣告。

最後需要說明一個問題，即上述幾個語例，早的在宋代，晚的在清代，時代相差較遠，能否對接比較語義？我認為還是可以的。作為科舉讀物出版的儒家經籍，是科舉考試的副產品。自南宋以來科舉內容基本固定，科舉用書也隨之僵化，出版業陳陳相因，清代的廣告語很可能有古老的淵源。從《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看，南宋末年已出現“銅板”，經明至清，不乏其例。而且到後來，出版商大概已不清楚“銅板”的本義，只知道它是自古流傳的與科舉用書有關的褒揚語，於是機械使用。這纔可以解釋為何到民國以後，還會有石印“銅版四書”出現。

可以說明“銅板”性質的文字資料少，實物斷層，也並非因為這個詞語使用範圍小、時間短，而是因為這類科舉用書都是敲門磚，用後即丟，無人重視。歷來藏書家不搜集這類書，即便買過、讀過、用過，也不會著錄在藏書目錄中，因此難得有文字資料可以引用。就像現代家庭以及圖書館不收藏中、小學生考試讀物一樣，古今情理，可以概見。不過對於“銅板四書五經”，雖然各大圖書館收藏得不多，民間和中小圖書館的收藏總量應該較多，期以時日，應會有更多可以表明“銅板”真正意義的資料，包括清以前的資料出現。那時就可以加強證據鏈中薄弱的環節了。

四、何謂“鑄金刷楮”

古書中另一條對印刷史研究產生影響的“銅版”記載，見於明崇禎刊本《夢林玄解》。其書有題宋孫奭的《圓夢密策序》，略云：

丙子春二月，偶經蘭溪道上，遇一羽衣……因出其書八卷，稽首授愚，辭舟而去……用不敢私，鑄金刷楮，敬公四海。

“鑄金刷楮”，從字面看包含雕刻金屬版和刷印成書兩個過程。因此印刷史家很重視這條資料，只是在所“鑄”之“金版”究竟是銅整版還是銅活字上有爭論。如張秀民就認為“以鑄刻銅活字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也有反對意見，李致忠認為，鑄造或刻製銅版造價高，難度大，一部圓夢之書不值得“鑄金刷楮”，“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已”^⑩。

早在四庫館臣為《夢林玄解》撰提要時，即指出孫奭的序“蓋術家依託之文”。王重民更是在《中國善本書提要》中考出，此序署景祐三年（1036），已在孫奭卒後（孫氏卒於明道二年，1033）三年，顯係偽託。^⑪因此，這不是一條可靠的資料。但如果孫序為宋人偽託，則“鑄金刷楮”的說法來源也很早，應該探明其真實意義。

如上文所言，青銅難以雕刻。如果“鑄金”確指鑄刻銅字，無論是整版還是活字，都難成立。因此，這句話應該“只是一種說法”，是語言問題而非技術問題。

由此思路溯源而上，我們發現問題也並不難解答。因為早從漢魏時代，人們就把神仙家言尊為“金簡玉字”。如《吳越春秋》卷四：

玄夷蒼水使者……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到後世，鑲金刻玉就成為稱頌道家典籍和道士文章的諛詞。這可以舉出很多語例。《全唐詩》卷三唐玄宗《賜道士鄧紫陽》：

下傳金版術，上刻玉清書。

《全唐詩》卷一百二十七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詩序：

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

宋徐積《節孝集》卷二十二《題紫極宮》：